

刘涤源教授的 主要经济思想和学术贡献

郭熙保 冯金华 徐长生

1997 年 11 月底,正当出版社把刚刚印刷出来的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一套 5 本送到该丛书主编刘涤源教授手中时,这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 85 岁老人却在病榻上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想到这位我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研究专家毕 20 年之心血却来不及看一眼他的这一重要成果就离开了人世,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惋惜。为了表达学生对恩师的深切怀念,也为了把他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介绍给后人,我们特撰写此文。

刘涤源教授 1912 年 12 月生于湖南湘乡,1939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接着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研究生,1942 年获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货币相对数量说》获前中央研究院 1944 年度杨铨学术奖金,这是当时国内最高社会科学奖。1942 年至 1944 年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讲师,主讲货币银行学。1944 年公派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947 年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毅然回国,被武汉大学聘任为教授,直到去世时止,他担任教授职务达半个世纪之久。期间,在 1952 至 1954 年兼任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主任。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坎坷 20 年。1978 年平反后,他回到教学岗位,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至此,66 岁的他才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刘涤源教授对前途总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对学术研究具有一种超人的执着追求,即使在下放劳动的艰苦岁月里,在被批斗的逆境中,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理论探索,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手稿。近 20 年来,他出版的许多学术作品的初稿就是他在牛棚里写成的。

他一生著述甚丰,大多数是在近 20 年中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货币相对数量论》(独著,1945 年出版,该书获原中央研究院杨铨学术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主编,1983 年出版,1990 年修订再版,该书获 1988 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阿·马歇尔经济学说提要》(独著,1985 年出版),《马克思 资本论 中的科学抽象法研究》(合著,1987 年出版),《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独著,1989 年出版,该书获 1995 年国家教委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西方利润理论研究》(合著,1992 年出版),《反通货膨胀论》(主编,1992 年出版,该书获 1993 年中国图书奖;1995 年湖北省首届省级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合著,1995 年出版),《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独著,1997 年)等。他在《世界经济》、《经济学家》、《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财经科学》、《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篇。此外,他主编了一套《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这套丛收花费了他晚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直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甚至在弥留之际还在关心着这套丛书的出版。

刘涤源教授的研究领域较宽,研究成果较多,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限于篇幅,下面我们将只对他三个领域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作一简要介绍。

一、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贡献

在刘涤源教授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其成果的社会影响也最大的是他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他对凯恩斯主义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他撰写的《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评议》(1989 年)和在此基础上修订扩充的《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1997 年)这两本书中。前一本书的出版受到学术界高度的评价。《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等十多家刊物对该书发表了书评,称该书为“凯恩斯主义研究的新突破”,“对凯恩斯主义最成功的研究”,“一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评析当代西方经济学著作的典范”,“剖析凯恩斯理论的成功之作”,等等。该书获得 1995 年国家教委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1. 刘涤源教授对凯恩斯主义的评论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正确立场和态度。他经常对学生说,西方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理论整个说来是比较肤浅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深刻的,是揭示资本主义本质规律的学问。他对待西方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具体地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既不骂倒一切,也不盲目信奉,拜倒在它的脚下。

在对待如何参考、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这个问题上,刘涤源教授的态度是,既反对全盘否定,也反对食“洋”不化。他认为,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借鉴和参考西方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是必要的,但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可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的东西。我国国情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同,如果生搬硬套,胡乱引进,势必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他举了两个生搬硬套的实例进行批判。一是盲目鼓吹高消费,导致严重的奢侈浪费;二是胡乱引进“温和的通货膨胀理论”,认为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有益无害,以致导致我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阻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当然,他也指出,对待凯恩斯主义也应采取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态度,决不能全盘排斥。凯恩斯主义的某些观点、方法和政策还是有用的,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例如,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与政策、投资乘数理论等对于我们进行宏观调控就具有参考意义。

2. 刘涤源教授对凯恩斯理论研究的一个创新性贡献是他对凯恩斯革命内涵的重新解释。他把凯恩斯革命归结为两大突破。第一,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学说史中,凯恩斯是从外因论转到内因论的首创者。传统经济学依据萨伊定律,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承认经济危机的确存在,并坦率承认,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到使现行社会濒临“全面毁灭”的极端危险境界。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失衡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相信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功能,因而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而凯恩斯则不相信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到充分就业均衡的状态,因此他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传统经济学家都坚持经济危机外因论,从外部冲突中去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而凯恩斯则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内因论,在经济制度中去寻找不稳定的内在结构,解释“繁荣内部为什么会孕育着使其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他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出发,得出资本主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常态,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凯恩斯对经济危机病因的诊断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他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凯恩斯革命的第二个内涵是,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凯恩斯是从自由经营论的旧观念转向政府干预论的新思潮的开创者,促进了一门新学科——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大量干预。

由于这两个突破,刘涤源教授认为凯恩斯在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确实堪称是一代宗师,“凯恩斯革命”与“斯密革命”、“边际革命”三者并列,称之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三大革命,可谓当之无愧。我们认为,他对“凯恩斯革命”内涵的重新阐释是深刻的,是有新意的,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没有人这样清楚地归纳过“凯恩斯革命”的内涵。

3. 刘涤源教授对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科学的客观评价。他指出,凯恩斯主义在战后20多年中由异端变为正统,上升到政府经济学,是与该学说具有相对优势密切相关的。他说:“凯恩斯新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病症、病象确认、病情诊断、对症处方等方面,相对说来,确有胜过其他资产阶级新老流派的优势。这就是它在这一阶段内迅速取得成效、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把凯恩斯理论的相对优势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它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病象看得比较准确;(2)它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有缺陷,一为失业,二为收入分配极为不均,有加以改进的必要;(3)在理论上,它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病症的焦点,紧紧地围绕这个焦点而展开其独特理论体系的构思和塑造;(4)强调政府干预,由国家调节经济,弥补私人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5)在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所创新。凯恩斯理论采取总量分析方法,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

但是,刘涤源教授认为,凯恩斯主义这些优势只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其他流派学说而言的。实际上,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案,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缺陷和错误是带根本性的。其中一个根本的缺陷是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把它错误地看作是三大基本心理规律造成的。凯恩斯把利息不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看作是流动偏好的报酬,这也是错误的。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是造成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由于凯恩斯理论的相对优势,凯恩斯主义由异端变为正统,统治西方经济学界达20多年,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和错误,造成了严重滞胀局面,这一

学说必然趋向衰败，从官方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

刘涤源教授还对 80 年代以来出现的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虽然 80 年代以来，各国的政府没有打着凯恩斯主义的旗号，但实行的政策显然带有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案的印记。刘涤源教授称这种情况为隐性凯恩斯效应。这一分析是符合事实的，是十分中肯的。

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贡献

在 80 年代，我国有一些人盲目崇拜凯恩斯主义，宣扬“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提出将通货膨胀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针对上述错误的经济思潮，刘涤源教授进行了严厉的反驳，他指出，“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的观点持有者并没有对凯恩斯主义的时代背景、社会哲学、根本实质、利弊得失、兴衰势态和历史地位等等学懂弄通，而是一知半解，企图全盘照搬。

为了纠正这股思潮，刘涤源教授组织编写了一本书，题为《反通货膨胀论——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的出版是针对我国 80 年代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而作的。后来正碰上了我国又一次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加上书名特别醒目，内容丰富全面，分析深刻，因此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先后获得中国图书奖和湖北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该书中，刘涤源教授在他撰写的那部分中着重从思想渊源上对我国关于通货膨胀的错误认识进行了剖析。

他详尽地论述了凯恩斯主义“半通货膨胀”理论实质及实践恶果。(1) 半通货膨胀的实质是，在经济衰退、失业严重、生产资料大量闲置的条件下，增加通货，推动物价上涨，降低实际工资，引诱企业增加生产，减少失业人数。“半通货膨胀”理论是一种对资本家有利，对工人有害的恶毒计谋。(2) 在经济危机深重期间，增加通货的扩张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确实能收到缓解危机，促进复苏的疗效。但这只能起“吗啡”注射的作用。如果注射时间太长，势必使经济机体功能紊乱，体质衰弱，涌现出史无前例的严重经济怪症。战后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主义“半通货膨胀”理论为依据，推行扩张性刺激政策：赤字、赤字、再赤字，膨胀、膨胀、再膨胀，最后导致了 1974—1975 年“滞胀”型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危机史上形象最怪诞，内容最复杂、解救最困难的危机——的爆发。以此为转折点，凯恩斯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终于从“政府经济学”宝座塌下来，丢下“滞胀”经济的烂摊子，使西方国家在整个 80 年代不得不苦战通货膨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进入 1985 年，我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开始骤然上升，到 1988 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高达两位数，抢购商品和挤提存款风潮遍及全国广大城乡，冲击着我们正常的经济生活，危及国家经济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通货膨胀的成因及治理对策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和政策制订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的学者说是需求拉上型的，有的学者说是成本推进型的，有的学者说是结构型的，有的说是三者兼而有之，更有人说是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众说纷纭，各有其理。但刘涤源教授针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实际情况，拨开现象中的迷雾，深入分析通货膨胀的真实根源。他从四个层次一步一步地剖析了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

1. 货币超经济发行是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货币流通量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国民收入及可供商品量等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使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这是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直接因素，但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是第一层次的原因。

2.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膨胀是通货膨胀第二层次的原因。财政“分灶吃饭”，企业自主权扩大，投资主体多元化，再加上严重的“投资饥饿症”及宏观调控体制不健全，导致新建项目遍地开花，基建战线越拉越长，并且投资效率低，投资结构不合理，使大量资金投放出去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产生有效的供给。刘涤源教授认为，将消费需求膨胀归因于工资增加，资金增长及消费“示范效应”是片面和不公正的。他指出消费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集团消费膨胀；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法规不健全以及“价格双轨制”漏洞的存在，造成有权势与关系的人和偷税漏税者成为暴发户，挥霍无度；行政机构扩大和人员膨胀，导致行政管理费逐年攀高，造成消费膨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构成的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必然引起物价总水平上升。

3. “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想与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彼此结合是造成总需求膨胀的病根。这是通货膨胀第三层次的原因。“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思想在改革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思想受到食洋不化的“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的理论支持，更加冲动，激发了“大干快上”、超经济发行货币加速经济增长的胆

量和势头，结果丧失了对通货膨胀的警惕性。

4. 体制和法制的不完善为“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以及“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的思想付诸实践创造了条件。这是通货膨胀的第四层次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体制与法制方面的缺陷既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也包括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经济主体的职能、相对地位以及经济体系对主体行为的规范约束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政府、企业各级领导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检查，决策的长官意志和个人专断，中央宏观调控不力，计划、财政、银行之间没有协调一致，市场机制不完善，等等。

综合通货膨胀成因的剖析，刘涤源教授提出了综合性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方案。具体包括：端正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坚决贯彻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总方针；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努力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增收节支，缩小财政赤字，力求国家财政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深化货币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积极开拓市场，整顿和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合理协调计划、财政、银行之间的关系，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刘涤源教授提出的综合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既治标更治本；既重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也兼顾经济适度增长。这些观点至今读起来仍然是很有洞察力的。我国近几年通货膨胀治理较为成功，基本上是与刘教授这些政策主张一致的。

三、关于垄断价格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贡献

刘涤源教授不仅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凯恩斯主义有高深的造诣，而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早在50年代初，他在从事《资本论》教学工作的同时，就着重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抽象方法和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运行机理这两个专题进行了研究。他搜集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并撰写了系列论文和几十万字的手稿。但令人痛惜的是，由于“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冲击，刘涤源教授的学术生涯被迫中断了整整20年。直到改革开放后，刘涤源教授在主攻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同时，与几位中青年学者合作，继续完成上述二个专题的研究。其成果反映在他与张旭初、梅荣政合著的《马克思 资本论 中的科学抽象方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他与陈恕祥、徐长生合著的《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垄断价格机构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中国物价出版社1995年版）这两部学术专著之中。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刘涤源教授关于垄断价格问题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和贡献作如下几点概括：

1. 关于垄断价格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刘涤源教授十分明确地指出，近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界摒弃价值只讲价格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和不科学的，他们完全摒弃“价值”那个实质范畴，而只承认价格这种表象形态，企图简单地、肤浅地、直接地用垄断价格体系去解释高额垄断利润，这是在价值—价格论这个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上的一大错误，必须加以纠正。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价值规律每每只作纲要性的介述，如“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市场供求调节中，价格围绕着价值而上下波动”等。刘涤源教授也十分坦率地指出，这种介述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在理论结合实际的鲜明论证方面显得过于简略，使人难以深入、明确而具体地加以理解。我们也必须对这种不足之处加以弥补。基于这一认识，刘涤源教授把《垄断价格机理研究》一书的中心旨趣和基本内容确定为：以价值规律——“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垄断价格体系这一研究对象为突破口，对“价值—价格”机理视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两者紧密结合，既探究垄断价格体系（同非垄断价格体系一道）以总价值量为基础、依归和极限，又发掘、概括垄断价格机制在营运中的制订规范和具体特征，揭示其独特地同价值相偏离、借以达到掠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

2. 关于垄断、垄断价格在概念上的界定。在《垄断价格机理研究》一书中，刘涤源教授开宗明义地将“垄断”这个概念的含义界定为“专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一个基本特征的巨型企业资本垄断统治”，而不是泛指别的什么垄断。他批驳了西方经济学中把垄断定义为“产品的差异性”的观点。他指出，按照这个解释，任何一个经营与别人不同商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都是市场上的垄断者。由此可以推论，自从有了商品交换和市场，就有了垄断，垄断与商品经济成了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意义上的垄断，在实质上掩盖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特有的产物和作为资本主义新阶段一个基本特征的垄断，即由生产与资本集中而形成的巨型垄断组织对市场的控制与操纵。在对“垄断”定义的基础之上，刘涤源教授进而将垄断价格定义为特指上述垄断组织所订定的价格。他指出，垄断企业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势力地位，对销售产品订定垄断高价，对收购原材料订定垄断低价，这只是垄断价格的一个

总原则。而实际上,作为资本主义新阶段基本特征的垄断统治,情况十分复杂,这一总原则由各个垄断企业具体运用起来,垄断价格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多样化的体系。例如,就采取差别价格的垄断企业来说,存在着水平高低不同的系列售价;就产品多样化的垄断企业而言,由于各种产品涉及的市场因素存在着差异,订定的各个价格水平高低并不一致;在一个产业部门的范围内,大都由少数几家巨型企业加以垄断,而它们彼此势力又有强弱之分,因此各自订定的价格水平每每存在着差别。

3. 关于垄断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刘涤源教授在批判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只谈价格而否定价值的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指出:在商品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价值与价格二者始终保持着实质基础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密不可分的机理——后者对前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偏离的独特而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这种依存关系是指整个价格体系以价值总量为基础和依归的总体依存关系;这种背离偏差是指单个商品价格对其所含价值表现出偏高或偏低的背离态势。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中,大体上,价格对价值先后出现了三个层次的偏离:首先,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市场狭隘,商品供求每难平衡,价格围绕着价值而上下波动,这是价格对价值的第一个层次偏离;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自由竞争阶段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格围绕生产价格而上下波动,这就形成了价格对价值的第二个层次偏离;再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价格进而转化为垄断价格,这就形成了价格对价值的第三个层次的偏离。这也就是说,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态,垄断价格又是生产价格的转化形态,垄断价格既以价值为基础,又同价值相偏离,而这种偏离在总体上最终却以价值为依归、极限和基础。正如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一样,总垄断价格与非垄断价格之和等于总生产价格。因此,在数量上,总价值、总生产价格、垄断价格与非垄断价格的总和,三者保持相等。

刘涤源教授特别指出,上述三者只是在总体上相等,而在个体上却存在差异,有的还存在着经常的、相当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整个国民经济以垄断资本统治为基本特征,同时却并存着为数极多的中小企业自由市场机制。就整个微观经济系统而言,分化为垄断企业而非垄断企业两大群体;就价格机构的订定规范而论,整个价格系统区分为垄断价格和非垄断价格两大体系。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两大群体,垄断价格与非垄断价格两大体系并存于整个国民经济机体之内,彼此之间既分野明显,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整个商品经济中总价值的分割方面处于此得彼失的相互关系:垄断组织通过以垄断价格而多捞得多少价值量,非垄断企业势非降低售价不可,从而相应损失多少价值量。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中,垄断企业利润率一般比非垄断企业为高,有的甚至相当高,这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系为主导的整个市场价格机制发挥独特而复杂的价值重分配作用而实现的。两个价格体系在这种价值重分配过程中,尽管在个体上有得有失,但在总体上却得失平衡。这决不是对价值规律在作用上的否定,而在最后结局上仍然以价值规律为依归、极限和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同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较为简单的运行态势相比,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内涵上又增多了更深一个层次的、特别明显地向垄断资本倾斜的价值重分配机理,从而使其具体运行得更加复杂化、多样化、隐蔽化而已。

总之,刘涤源教授认为,“价值—价格”机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不容片面、割裂。如果把“价值”割裂掉,则“价格”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就无法理解价值规律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中的运行态势,也就更不可能对垄断价格机构在市场中通过特别有利于垄断组织的倾斜型价值重分配,从而掠取高额垄断利润这种实质关系,作出正确而深刻的科学解释。

4. 关于垄断价格机理的实证分析。《垄断价格机理研究》一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垄断价格的本质分析,同时又吸收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垄断价格现象形态描述上的合理内容,用大量篇幅对垄断价格的机理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垄断价格的形成与传递机制;(2)垄断价格体系的特点、变化趋势及其影响;(3)政府对价格体系的干预和调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刘涤源教授关于垄断价格问题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纠正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这个课题上的错误思路和片面解说,另一方面也弥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有关缺陷与不足,因此在这个重要的经济理论领域起到了一个填补空白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刘涤源教授毕生研究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治学态度,那就是“实事求是,明辩是非,以理服人”。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杨宗传)